

历史学家为何关心生态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思考

王利华

摘要 环境生态问题关联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领域,具有空前的广域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文理过度割裂的“分科治学”不能适应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环境史学者试图跨越自然与社会边界,借取多学科理论方法考察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变化,为跨越“两种文化”鸿沟、融通科技与人文搭桥铺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夯土筑基,通过不同时间尺度的历史考察,深入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应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努力树立新的历史价值观,建构中国特色环境史学思想知识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资鉴。

关键词 环境史;生态文明;跨学科研究;两种文化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5-0096-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80);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2016);生态环境部“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科普工作”项目(0747-1561SITCA037)

一般认为:历史学家主要考察人类社会演变,生态环境则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其实,历史既包括人类史也包括自然史,只因近代以来学科分立,术业专攻,史家倡言“历史是人的历史”,尔乃忘记人类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生物和文化双重属性,环境与社会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如今所谓生态问题,主要还是人的问题——大多由人类行为造成又反馈于人类社会,牵连极其复杂的社会因素特别是利益关系,自然科学家既不能独自认清更不能独自解决,人文社会学者亦应参与探研。历史学作为人类独有的一种理解生命、认识社会和探究世界的方式,是一门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学问。每当遭遇新的问题和挑战,人们都要重新回望过去,叩问历史,从中获得启示。当今世界,自然资源日益匮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文明面临空前严峻考验,历史学家不欲置身事外,漠然视之,故有环境史学兴起。作为一种新史学,其视阈不再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是致力于系统探究人与自然的既往关系,以回应时代关切,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最相契合,在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今天,尤具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

一、环境史研究欲为融通科技与人文搭桥铺路

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环境史研究在初起之时都曾遭到过质疑: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生态、给环境写史吗?如今这种质疑已经不多,但环境史怎样书写、有何作用,却依然颇多疑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全球气候的变化、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冰川融化、核威胁和我们感触最深的水、土、大气、食物的污染等等都是自然科学家应该探研的问题,而非历史人文学者所擅长。然而,简要回顾近代以来的国内

外学术史便可发现,这些怀疑乃是源于近代以来“分科治学”所造成的偏见和弊病。不论从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既往关系,还是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来看,这些偏见和弊病都是不该出现和应当破除的。

首先需要指出,“历史”并不只是“人的历史”,至少不只是“社会人”的历史。历史学家应当关心自然变化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即便只书写人的历史,也应该注意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无法摆脱的自然属性,这一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最终的依赖关系,否则就不能全面认识人类、社会和文明。中国传统史学原本博综天人,正史多设天文、地理、灾异等志,而地学著作多归史部皮藏,卷帙浩大的地方史志更是综括天、地、生、人。及至近代,因受西学影响,正统史学才一边倒地偏向了人类社会历史。其实,在中国近代史学创立者们心中,“史”也并不单指“人的历史”,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他们明确指出,史学具有“合众科而自为一科”的特殊性质,“史”的范围极其广泛,且与各种自然、人文、社会科学互不可缺^① (P676-677)。梁启超最早把史的范围圈定为“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天象、地形之类自然现象皆非史的范围^② (P1),但其新史学构想体系庞大,涵盖极其广泛的领域。他非常清楚史学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关系,批评旧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与他学之关系”^③ (P10-11),认为众多学科包括“天然范围”的自然科学公则公例都可供史家参考利用,这些与当时许多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然而非常遗憾,在所谓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受日益强固的“分科治学”体制影响,历史学被划到“文科”,从此教学和研究同自然科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终致两相悬隔,导致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在主流史学中经常性地缺席或者被虚体概念化。这不仅背离了中国史学传统,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历史唯物论时反复强调人的自然属性、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作用,亦发生了明显偏离。

另一方面,当今各种“环境”和“生态”问题都不仅仅是自然问题,它们也是(甚至主要是)人的问题。因为“环境”首先是人的环境,是以人为中心来界定的;“生态”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众多事物和因素之间的关系状态。环境生态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它们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否则人们怎会关心挂怀呢?追溯问题成因可以发现:自古至今,我们这个星球已然发生沧海桑田式的巨大改变,自然环境愈来愈被人工化,越来越多的生态问题实为人类活动所致。观察现实亦可看到,环境生态问题是有史以来人类遭遇到的最具广域性和复杂性的难题,如今环境保护的最大短板和制约,并非科技能力低下,而是人的工作难做,单靠自然科学家并不能认清问题本质,更无法拔除危机根源,以探研“人事”为主要职责的社会科学和历史人文学者亦须参与并且贡献智慧。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须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历史人文众多领域学者合作研究、协同推进。这意味着行之已久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彼此分离、相互割裂的学术活动方式,需要进行一场重大变革。

回顾学术史可知,不同时代人类为了生存发展,都需认识和处理各种自然、社会问题,从而形成相应的认知方式和思想知识。在农业时代及以前,人类认知以直观经验观察、内在心灵感悟和整体综合论说作为主要特征,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近代以来,分析科学迅速发展,与社会职业(专业)细化分工互为表里,材料实验、仪器观察、数据分析、假说论证成为共同范式,对具体事物和现象的认知水

① 清末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所编《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可能是近代最早正式出版的中国史新式教材,其中就史学与科学的关系提出了一番见解,认为:“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

② 梁启超明确将“史”的范围圈定在“人类社会赓续活动”,认为历史学是记述人类社会活动情态、评估活动成绩和探求因果关系以为现代资鉴的学问。由于梁氏该书的巨大影响力,这大致成为此后学人对历史学的一般理解。

③ 他指出:“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自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平突飞猛进,成为近代工业文明兴盛的主要基础。然而,以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学术,随着时代发展逐渐暴露出严重缺陷。不断强化的“分科治学”体制导致学科划分日益细碎,各科均按自身逻辑和取向推演发展,与其他学科互相隔离甚至彼此排斥,理论方法自成统系,知识技能不断专业化,逐渐陷入“闭锁”(Lock-in)和“内卷”(involution)状态,对世界的认识渐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术发展往往偏离初心。

更严重的是,人类社会考察与自然科学探究及其人才培养长期彼此割裂、分途发展,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者之间形成愈来愈难跨越的巨大鸿沟。近世以来,人类科技能力迅速增强,人文精神和道德水平非但没有同步提升、反而渐趋弱化,导致工具主义和物质主义日益盛行,心不御物,德不配能,能够带来巨大直接经济效益的实用型技术愈来愈加强势,只顾眼前而不思长远,贪图一利而不谋全局,误用滥用负面影响日益增多,浸成大祸。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席卷全球,人类事务日益繁杂和聚合化,迫切需要在精细分工的同时广泛开展合作。这一客观形势,驱动学术研究走向学科交叉、融合,不仅自然科学的不同科类需要合作,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亦需互相沟通。当今世界的那些根本性和基础性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健康问题、食物问题等等都非单一学科所能解决。一项重大事业决策,往往牵连众多领域,既有科技问题,也有个人、社会和文化问题,故当代国家决策日益重视专家咨询、科学论证,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是若非多学科综合论证,仍易顾此失彼,发生偏差,或局部合理而整体谬误,仓促实施则每每造成重大灾难性后果。因此,通过发展交叉学科,推动交流、合作、协同和集成,既是具体学科门类深入拓展的需要,也是制定重要决策、应对复杂难题和开展大型建设的需要,在深层意义上,还是培养德性与能力健全均衡新人类的需要。这也许正给史学发展变革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自然与人文严重疏离、物质与精神严重割裂而人类事业亟须统合的今天,本具“合众科而自为一科”性质的历史学,或可在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鸿沟之上架起一座彼此通达的桥梁。

关于“两种文化”的差异、分离和融合问题,西方学界自笛卡尔和维科以来已经讨论很久。有人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①[4](前言),更多则试图将它们统一起来^②[5](P42-46),长期过度割裂的弊病令人忧心忡忡。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做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说,疾声呼吁重视“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以文学为代表)与“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以物理学为代表)两种文化分裂现象以及两个群体互相隔离、彼此轻视的后果^③[6]。在斯诺看来,“这种两极化对我们大家只能造成损失。对我们人民、我们社会也是一样。同时这也是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这种文化分裂现象不仅限于英国,也遍及于整个西方世界。”造成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这在我们心目中根深蒂固”^④[6](P11,16)。确实,顺应产业、行业和职业分工不断细化的趋势,近代学术以“分析”为主要特征,不论自然探索还是社会考察都是分科进行,教育工作也不断走向专科化和专业化,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群体分化:一些人献身于物质世界探索,另一些人则专注于人类社会观察,“两种文化”不断疏离甚至彼此对立。斯诺对此特别担忧,并表达了对“第三种文化”的期待,他说:“一些社会历史学家既同科学家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又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在过去10年的知识启发下,也曾经使用过这样一些概念,如‘有机共同体’或前工业社会本质或科学革命。这些新的研究对我们的智力健全和道德健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⑤[6](P68)他很期待社会历史学家能充当对话、交流的桥梁,为填平“两种文化”鸿沟作出贡献。

前曾言及,中国传统史学自有学统,史家博综天人,虽然存在诸多缺陷^⑥[3](P2-6),但思想体系涵盖天、地、人“三才”,具备有机综合性质。然而自近代以“西学”改造“中学”,传统史学被迅速肢解,遵循“分

① 例如德国弗莱堡学派和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将“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并将它们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特别强调历史的个别化方法和特殊性原则,否定历史规律探索。译者前言对其主要思想做了恰当的概括和批判。

② 随后斯诺又多次演讲,后结集出版《两种文化》一书,引起了广泛关注。

科治学”理念而构建的“新史学”与“旧史学”相比可谓体系大变,旨趣迥异,百余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毋庸置疑,但“分科治学”所带来的弊病亦不可否认,专注人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关系,忽视人的生物属性和人与自然关系,殆为最应认真检视、反思的问题之一^①。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者因应时代变化在文化与自然交错带上新辟的园地,也是多学科合作的试验场,因这门新史学具有毋庸置疑的跨学科性质——不只横跨人文社会诸学科,而且跨越文、理、工、农、医众多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博综天人的中国史学传统。在日益深阔的“两种文化”鸿沟之上搭建一座彼此通达的思想桥梁,是环境学者的重要学术理想。

在美国环境史学主要领袖之一唐纳德·沃斯特看来,持续存在于我们知识生活中的科学与人文隔裂造成了严重后果,环境史这个新兴领域为桥接彼此隔裂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提供了机会,它要求历史学家更熟悉环境科学并将其洞察力应用于探研过去^[7](P3-14)。在《穿越河堤的小径》一文中,他充分表述了“两种文化”汇合的意义,指出:

现在(引注:1990年代)……, we have an opportunity and a reason to find a new common ground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is opportunity appears in the form of the world environmental crisis, from the winding, tortuous Mother River extending to the Amazon, the Nile, and the Mekong. Scientists, historians, and even those from all disciplin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should walk together, find a path across the professional divide, understand our common life in nature. This is not only for us as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bu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arth and all its residents.^[8](P29)

沃斯特表达了历史学者的新追求,为中国同仁所赞同。对此,国内学者侯深在专文《穿越河堤的小径——站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环境史研究》中有很好的介绍和发挥。事实上,中华民族历史底蕴更深厚,与大自然交往的经验更丰富,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和资源挑战亦更严峻,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崭新理念,中国历史学者应胸怀更加远大的理想,勇敢担当新的使命。

环境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并非为攻克当前急迫而突出的环境难题提供手到病除的灵丹妙药,而是透过人与自然长期交往的经验事实,帮助世人理性认识环境问题的历史复杂性,诊断生态危机的病根和由来,正确认识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历史学家纵深观察、广泛联系和综合评判的研究习惯,使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更具时间纵深感和历史流动感,有助于避免在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上陷入短视、片面和简单化。

二、环境史研究欲为生态文化建设夯土筑基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文明是历史的积淀与更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既需挣脱历史的羁绊,更需凭借历史的垫筑,文明道路始终需要历史理性之光烛照。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和枉顾历史、遗忘教训,都将迷失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纵贯历史、现实和未来,直面中国和世界文明所遭遇的空前巨大挑战,作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定抉择。这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全体人类共同命运的根本大计,是一场通天彻地的巨大变革,具有空前广域性和复杂性,不能缺少既往经验借鉴和历史理性导引。深入揭示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规律,系统总结过往经验教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史思想知识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大厦夯土筑基,是新时代赋予历史学者的新使命。

作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中的一项基础学术,环境史研究的特殊功能首先体现于其思想认识意义。当今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如何积渐而至?何以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且将其上升到国家最高发展战略?具有怎样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这些问题应从不同的历史时间尺度加以认识。

一是从人类生存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认识。众所周知,早在数百万年甚至1000多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在地球上诞生,这是地球生命进化的偶然结果。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沿着两条互相缠结的主线而

^① 对此笔者另有《如何跨越“两种文化”鸿沟——中国环境史学者的理想和困境》一文专论,兹不展开。

展开:在人类种群内部,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主线,以生产方式为主轴,先后完成由采集捕猎到农耕畜牧、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重大转型,如今正急速迈向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在地球生物圈中,以人与自然关系演变为脉络,以自然资源开发和物质文明进步为标志,人类能力逐渐提高,劳动实践的范围、规模和强度不断增加,对地球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扰动不断加强,不仅在同其它物种的竞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而且最终具有了足以摧毁地球母亲的超强能力。

历史告诉我们,自从有了人类,便产生了环境问题,这里的“环境”是以人为中心界定的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环境。“人猿揖别”之后,随着人与自然的交往不断扩大和加深,环境问题亦渐趋增多和严重。但不同时代环境问题的内容、性质、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不同,古今对比实有巨大差异。采集捕猎时代,人口十分稀少,工具极其简陋,思想意识模糊,生活游荡不定,与毒虫猛兽争夺食物和居所并无显著优势,生命随时遭遇威胁,故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盛行,对自然界的扰动能力亦很微弱。农业时代,人类不断增强自我意识,分辨天人关系,既讲人定胜天,也讲天人感应。经济生产以植物种植和动物驯养为主,社会生活顺应自然节律,生态环境甚少污染,但盲目无序的资源开发和环境改造已然造成局部地区资源耗减、水系紊乱、水土流失和地力衰竭,许多古老文明因此相继衰亡。最近 200 多年来,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极大增强了人类的能力,造成人们几乎忘记自己究为何物?何所从来?在精神上疏离自然,在行为上灭裂自然,在无限物质消费嗜欲特别是资本利润贪心的驱使之下,人们运用强大的科技武装钻天入地,涂炭生灵,粗暴鲁莽地对待大自然,彻底搅翻了地球生命系统,人与自然矛盾迅速加剧,文明发展陷入严重悖论。其必然的结果如今所见,缺乏生态道德约束的能力正在通过大自然的严厉报复不断反噬人类自身,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命健康安全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早在 100 多年前,恩格斯就已明确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9](P519)

然而百余年来,随着科技、工业、资本和市场不断取得巨大成功,工具主义、消费主义和金钱主义日益盛行,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愈来愈傲慢,环境行为日益恣意任性,终于招致自然界的强烈反馈,环境灾害接踵而至,西方国家发生了著名的“八大环境污染(公害)事件”,全球气候变化更是令人担忧文明的前景。50 多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评论说:“在 1763-1973 年这 200 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①^[10](P523)在汤因比发表上述评论之时,人们已经开始悲叹“寂静的春天”,担忧“增长的极限”,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些行动。但由于欲望和惯性过于强大,自那以来,人们仍在以更快速率和更大规模不断损害着地球生态,至今仍然不能确定全球环境恶化趋势何时能被有效遏止。

将迄今以往的各种文明形态放到人类生命长河之中进行观察,可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发现不同的历史面相,贯穿古今的是人类力量与自然力量彼此消长。成千上万年来,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方向是人类不断挣脱自然束缚,最大化地攫取自然资源,追求日益充裕甚至奢华的生活。时至今日,情势大变:当今世界的最大困局并非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无限的人类物质生活欲望与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消解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是人类以高度精神自觉

①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二章、第八十一章均以《生物圈》为题,表明了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对地球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关切。

约束无限物质欲望,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汲汲以求的目标,也是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二是从中华文明发展的独特历程来认识。一部中国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所在自然生态环境协同演化的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这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宝贵遗产。

研究表明,由于青藏高原隆起、喜马拉雅山脉形成、气候冷暖旋回、东部海面升降、黄土地带和黄土地带高原风尘堆积,以及黄河、淮河、长江大江大河形成演变等一系列自然运动和变化营造了一个适宜的人类生存环境,在地质学上的第三纪至第四纪之间(大约距今 300 万年前),中国境内开始出现古人类,考古学家陆续发现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类遗迹。不过,最新分子人类学特别是 Y 染色体 DAN 研究认为,那些古人类只是我们的远古近亲而非直系先祖。我们的直系祖先是在大约距今 7 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期结束后才从非洲大陆迁徙而来,他们是第二批甚至更多批次的“非洲来华移民”。这些远古人类一直在莽原密林之中迁徙流浪,采集渔猎。距今一万年前,南北各地开始出现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先民逐渐改变生计策略并对自然物种和水土环境实施控制和改造。及至距今 5000 年前,中华民族开始跨进文明门槛,不断开发自然资源,改变生态环境,发展农牧经济,创立华夏文明。自上古三代,历秦汉隋唐,至宋元明清,民族、国家不断发展整合,形成了庞大的东方文明体系。5000 年来,青铜、礼乐、长城、运河、诗词、绘画、农学、中医、四大发明……无数灿烂的文明成果独步天下,让炎黄子孙由衷自豪;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血雨腥风的战争动荡,风云诡谲的政治变局,乖舛不定的命运沉浮……令古今史家追怀幽思。所有这些文明成果和人间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国千姿百态的自然环境之中,与共生在这片辽阔疆土上的万类生灵息息相关。

最本底的中国历史故事,或许并非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是这片疆域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化。最近一万年,在整个人类生命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正是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彻底改变了生存方式,也渐渐远离了大自然。农业的发明和发展,彻底改变了资源利用方式,也极大提高了生态承载能力。数以十百计的动物和植物种类被驯化家养和栽培,以五谷六畜为代表的植物和动物与人类互利共生,共同进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生命支撑,远古稀少的人群不断孳繁,如今已有将近 14 亿的庞大人口,绝大部分一直聚居在适宜农耕的“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为了求取食物和衣料,人们把林地、草原、湖沼、丘陵、山地等开垦为旱地、水田、梯田,修凿了无数灌溉、航运和防洪工程,不断开采和利用盐、煤、石油、粘土、金属矿石等各种地下矿藏,为中华文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漫长生存实践中,中华民族不断思考天人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智慧,古贤相继提出并且不断阐释的天、地、人“三才”有机统一的系统观,“生生之德”和“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取用有节”的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观,以及亿万农民 4000 年来始终持守的“变废为宝”物质循环利用传统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生态文化遗产。它们不仅体现了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邃思考和理性实践,而且隐含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奥秘。

毋庸讳言,迄今为止的所有文明发展都付出了相应的环境代价,中华文明亦不例外。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中华文明 5000 年延绵不断,但古今环境变迁之巨可谓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其中既有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积极改善,也有后果恶劣、令人慨叹的鲁莽破坏。数千年来,中国 80% 以上的山林草泽因不断砍伐、垦辟和堙淤而消失,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被侵蚀成荒漠,曾经辽远广阔、坦荡如砥的黄土高原逐渐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森林植被破坏造成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水土流失导致众多河流水系紊乱、直至干涸断流,黄河在 2500 年中决溢、泛滥多达 1500 余次并多次发生严重改道,长江洪涝灾害在最近几个世纪亦渐趋严重;难以数计的湖泊洼淀逐渐瓦解、堙废直至完全消失;由于长期猎杀和栖息地破坏,大量野生动物种类悄然绝迹,曾经广泛分布的麋鹿、大象、熊猫、鳄鱼等已成珍稀物种。

历史资料显示,中华民族至少曾经两度遭遇相当严重的环境资源危机。第一次发生在周秦之际。当

时中国文明中心区域——黄河中下游,人口增长和土地垦辟导致山林川泽资源渐趋枯竭,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等重要物资供给匮乏,社会普遍担忧樵采、捕猎和“百工”(手工业)生产难以为继,诸侯国家则害怕“山泽之征”失去保障导致国力贫弱。作为应对策略,国家设置各种礼法禁令节制樵采、捕猎,维护山泽资源再生能力。随着统一国家建立和社会经济转型,那次危机得以化解。第二次发生在清朝中期以后。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持续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4.3亿,平原地区人满为患,大量流民涌入深山大壑,盲目毁林垦荒,导致森林减耗、水土流失、山区岩石裸露、平原水系紊乱,生态环境全面恶化,水旱灾害日益频繁,环境—经济—社会关系严重失衡,这些意味着已经持续几千年的人口(劳动力)增加—农区扩张—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在此情形下,有识之士发表大量议论,指出自然灾害的根源,强调山泽保护的意义,甚至提出控制人口的思想。朝廷和地方官府推行不少政策举措禁垦禁围,鼓励植树造林,各地护林保水、限樵禁猎的乡规民约大量涌现,但并未遏止环境恶化趋势。进入19世纪以后,经济凋敝,灾荒荐至,国家积贫积弱,百姓生计维艰,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更使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深渊,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跌落到了历史谷底。近代民族、国家危机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传统生产方式陷入生态困境,包括环境恶化和资源匮乏,也是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和表现。正因如此,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全面调适人与自然界关系,走出长期积渐所至的危机和困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历史深处的呼唤,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三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来认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古老中国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内陷困蹙,外遭欺侮,环境恶化,灾害频仍,亿万民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谋求复兴,上下而求索,经历了无数彷徨和挫折。历史大浪淘沙,最终作出了正确选择: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中华民族经过浴血抗争,终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最具历史使命感的伟大政党,自诞生之日即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富强为己任,以谋求最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初心,百年以来奋斗不息,先后完成了不同阶段的重大历史使命,领导中国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创造了人类史上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建设生态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使命,关乎中华民族长远福祉,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需要放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加以深刻认识。

新中国建设是在满目疮痍的艰难条件下起步的。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中国在短短几十年中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历经多个世纪才完成的文明转型,70年经济发展和进步的规模与速率,旷古未有,举世惊叹!但历史总是充满矛盾和曲折,世事往往利弊相兼、福祸相倚。“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不断激发中华民族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急切期盼,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时代焦虑”。摆脱贫穷、繁荣经济对于劫后重生的中国及其执政党来说,既容不得片刻迟缓亦难以事事从容。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对GDP增长过度热衷,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承载能力认知不足,对人口—经济—环境矛盾协调不够,对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设计不周、体制不全,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空前巨大成就的同时,导致自然环境承受了空前沉重的负荷和压力:自然资源损耗,空气、水体和土地污染,这些在经济急速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了结构性、叠加性、压缩性和复合性等多重不利特征。若不能迅速坚决予以扼制,势将导致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交叠增加,甚至动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根基!

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必然地引起了深度的文明忧思。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5000年中华文明能否永续发展?这些文明危机意识促进了社会觉醒,也引导了环保实践。从环境史角度来看,当代环境危机是长期历史累积的结果,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情势所推致,也是国人在享受现代化、工业化福利的同时不得不承受的代价,必须基于历史理性给予

“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攸关千秋万代生活福祉,绝对不可轻视之。

坚决遏止环境恶化,积极化解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文明继续前进的必由之路,是保证炎黄子孙福泽绵长的根本大计,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坚毅地担当起这一时代伟大使命。自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更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1]。初步擘画了一个崭新的文明蓝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战略地位,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之成为体现亿万人民更美好生活愿望的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多年来,习总书记对生态文明作了大量精辟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反映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的深谋远虑,饱含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其深邃哲学思辨、理性问题分析和坚卓实践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和人类崇高理想紧密结合的崭新境界,占据了人类道德和自然道德的制高点,上应天道,下顺民心。近年来,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和峥嵘岁月,历史学者有责任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忠实的记录,给予客观的评判,使其传之后世,激励来者。

三、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思想知识体系

环境史是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相继兴盛之后的新史学类型或形式,有其特定的学术目标、概念体系和解说框架。虽然尚有不少基本学理问题并未形成普遍共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同仁特别创立这门新兴史学,努力开展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边界的历史问题探究,旨在回应当今社会对环境生态危机的普遍关切,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服务意识。在中国,它更是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数量庞大、生态欠债沉重等特殊国情,中国环境问题具有压缩性、结构性、复合性和叠加性等诸多不利特征,这导致过去数十年环境保护工作长期处于应急状态,与更加直接紧迫的环境保护科技、工程、产业、法制等等建设发展相比,偏于软性的生态文化建设显得相当滞后。作为生态文化建设基础内容的专门环境史研究,自起步至今还不到20年,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与中国极其丰富的环境历史经验和生态文化积淀相比,对照迅速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都还显得相当滞后和不足,需要特别加快努力。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方法、概念话语的系统建构工作尚未完成,分散的成果尚未综合提炼形成完整思想知识体系,优质学术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公众对现实环境问题缺乏历史理性认识,一些错误的观点广泛流播。大力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思想知识体系,是我们这代历史学者不可推卸的学术职责。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环境史同仁必须致力于努力完成以下基本任务:

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树立新的历史价值观。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础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理论作为指导。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P49)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

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3](P23-24)由此可见,经典作家是以人的生命(肉体组织)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第一个前提来建构其唯物史观的,这应当作为中国环境史学建构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同志继承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吸收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结合当代环境保护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完整理论体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等等一系列的重要精辟论断,既是全党全国人民奋勇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方针,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的重要理论指导。

与以往历史研究相比,环境史学具有更加本底的历史问题关怀。它以“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为学理思考的起点,首先明确人类是一种与大自然血肉相连、情感相连的特殊生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靠大自然而存活,并且与其它生命形式和各种环境因素构成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环境史学以“生命”作为第一个关键词,把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把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作为思想焦点,从而展开历史叙事和问题解说。

环境史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研究主题,致力于揭示成千上万年来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过程、机制和规律,并由此展开深度的历史反思。大量史实证明:人与自然之间自古至今始终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其广度、深度和烈度于今最剧。如果说古时的人与自然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人类力量孱弱,处处受到各种不利自然因素钳制,那么当今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则主要根源于日益强大的文化力量对自然“生生之道”的严重背离。这种背离是双重性的,一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背离,二是对人类天然本性和根本利益的背离。它们都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推向关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基于大量历史事实,运用先进思想理论,对以往文化或文明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检讨,从而为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提供丰富的历史资鉴。

与以往历史研究不同,环境史不只在理论上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把众多自然事物和环境因素及其变化纳入实证考察对象。它批判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时摒弃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强调“生命共同体”理念,既反对罔顾其它物种的生命价值也反对完全脱离人的生存需要来讨论环境问题。它还努力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尝试以复杂性思维透过时间纵深认识人的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考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因应—协同关系,寻找文明的自然之根和自然的文化之魂,从而帮助人们从历史维度深刻体认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根本大计的深远意义,树立自然道德与人类道德有机统一的新价值观,自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守卫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根基。

二是以史实为依据深度解说自然环境作为先在客观条件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意义。环境史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它将自然环境诸多要素纳入具体的历史叙事,实证地考察大自然在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重建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面貌无疑是环境史研究和编纂的基本任务,但更重要的工作是努力揭示气候、地貌、土壤、河流、湖泊、陆地、海洋、植被、动植物种等众多结构性环境要素及其变化如何历史地规约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既提供条件亦构成障碍,从而塑造不同时代、区域和民族的物质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风貌。

三是系统地讲述自然环境作为生命场域是如何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发生改变。任何时代的人类活动都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地域空间和自然条件。与其它动物的本能行为不同,人是文化动

物,主要通过文化机制自觉适应环境、利用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们,凭借着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创造了复杂多样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工具技术和物质设施,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反过来,又对自然界施加了愈来愈广泛而且深刻的影响,在推动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亦造成自然环境不断发生各种改变甚至严重破坏。系统讲述中国古今环境的变迁,揭示其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驱动力,反思人类活动不当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后果,有助于了解当今各种环境问题是如何积渐而至,从而历史理性地认识当今环境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本质。

四是总结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优秀生态文化并积极阐释其当代价值。中华民族向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优秀传统,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它们既是古老中国文明不曾发生严重中断的历史奥秘,也是中华民族继续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石。成千上万年来的中国先民以“实用理性”“神话宗教”“道德伦理”“诗性审美”等等不同认知方式认知自然、理解生命,自然观念、生物知识、家国乡土情感、山水田园审美、自然资源保护等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它们曾经深刻影响了先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基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行系统整理、精粹提炼和创造性转化,使之发挥唤醒自然情感、培养生态品格、化育道德人心、倡导绿色生活的积极作用。

五是揭示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协同演变的时空过程和规律,为重大规划决策提供历史参考。中国疆土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生态系统多样,民族文化多元,吾土吾民的生命活动经历了多个治乱交替的历史回旋周期,生生不息,不断壮大。从莽莽荒原上的点点篝火、“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到文明国家的诞生,从黄河轴心时代中原文明之花率先盛开到南方区域的大开发和大繁荣,自然特征和资源禀赋差异显著的辽阔区域逐渐整合,最终形成百川汇流、多元一体的庞大文明体系。这一历史过程波澜壮阔,时代漫长,机制复杂,既非自然环境的自行演化,亦非人类社会的独自发展,而是包括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众多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反馈和协同变迁。紧扣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围绕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线,追寻 5000 年文明的生态足迹,不仅将重构中国历史知识体系,深化对中华文明特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广域生态系统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促进地区协同发展和优势互补,最终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 [1] 陈德溥. 陈黻宸集: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36.
- [4] H. 李凯尔特. 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 涂纪亮译. 北京: 商务印务馆, 1991.
- [5]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 第二自然: 意识之谜. 唐璐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 [6] C.P. 斯诺. 两种文化. 纪树立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 [7] Donald Worster. “The Two Cultures Revisi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996, 2(1).
- [8]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10] 阿诺德·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 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 徐波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1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Why do Historians Care about Ecological Issues?

Thoughts on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 Lihua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issues are related to many field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unprecedented scope and complexity. The long-term “sub-disciplinary study” with excessive divide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s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attempt to cros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and use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to examine the complex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history, paving the way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and integrating technology with humanity. The main task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is to build a foundation for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and to clarify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a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roug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should strive to establish new historical values, construct a knowledg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historic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Xi Jinping’s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wo cultures

■ 收稿日期 2019-05-31

■ 作者简介 王利华,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

■ 责任编辑 桂 莉